

烟潍公路的“红色印记”



吕杰

从朋友手中收集到的一张泛黄老报纸,报头位置写着报名《胶东日报》,下方写有原名《大众报》,为第二四九五期,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七日发行,本期共两版。

在报纸的二版左上部分,有一篇关于烟潍公路通行的布告,原文主要内容如下:《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、胶东军区司令部联合布告》(路字第1号)查烟潍公路,连年因战争,未便建立路政管理工作,各种车辆,尽皆通行,路面时被破坏,反复修补,不仅疲劳民力,阻滞运输,而车辆行人往来拥挤,致有纠纷与危险事件之发生,时值全国胜利在望,解放区运输事业,日益发展,支援战争运输任务,将更为繁重,因而公路之管理工作,亟需建立,以保障车辆顺

利通行,避免车辆肇事,安全行旅,现烟潍公路已开始修复,附路亦修补竣工,为此特规定:一、凡公私之铁轮、木轮、硬胶轮大小车辆,应一律在附路上行驶,严格禁止在公路上通行。二、凡行驶之车辆及行人,一律靠右边走;如车辆发生故障,亦应靠右边停下,但不得两边同时停车。三、雨后路面不干,禁止通行;如有特殊紧急任务,应持有专属、军分区以上之证明文件,并与公路段、站取得联系,方得通车。四、凡路旁设立之摊贩,一律要搬到排水沟以外,以免障碍通车或发生危险。五、凡排水沟两边之树、草,任何人不得私自剪伐,亦不得于排水沟内取土。六、车辆行至城市,须受交通警察之指挥,行于公路,应受公路段、站养路人员之指导,沿路各村民兵、自卫团亦有保障公路及维持交通秩序之责。以上规定,自公布日起实施。仰各公私大小车辆及一切行人,一体遵照,不得故违。

可见,在全国胜利解放的前夕,烟潍公路为保障交通,

“先行”开始维修,为告知广大群众,在当时的《胶东日报》上刊发了一则类似今天施工公告性质的布告。

让我们沿着时间脉络,追溯一下烟潍公路。自秦时起,该路就是驿道、官马大道,民国初期成为举足轻重的省内交通干线。并有“车马会青莱之道”的辉煌。

而自1938年2月日军侵占烟台后,至1945年秋,沿线军民为打击侵略者,不断破路袭桥,致使此线时断时续,烟台仅能勉强通至龙口。1947年秋,国民党军队占据烟台,该路又陷入瘫痪。1948年秋,烟台再获解放,公路管理机构恢复,胶东行署动员数十万民众抢修公路,经广大军民奋力抢修,于次年全线迅速恢复通车。

由此推算,恢复通车后,为确保烟潍公路更畅通、更安全,当时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、胶东军区司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烟潍公路通行的布告,刊登在《胶东日报》上。另据《烟台公路志》(1949—2005)记载:“1947年,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关于各公路沿线



养护小组暂行办法》,沿线各村均建立养护小组,划段包干,把养路工作作为经常任务之一,为解放战争服务。”

解放之后,烟潍路不断加固维修、改造,后来全部改为沥青路面,路宽也有所增加。跨越的河流等都修建了新的大桥,代替了旧时的木桥和漫水桥,基本达到国家二级公路水平,在较长时间里,是胶东地区西行的主要道路,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解放前后的历史节点上,烟潍路毅然承载起了那时的交通、发展需求,推动着新中国的憧憬和梦想照进现实,这张积淀着岁月痕迹的报纸就是那段“红色印记”最好的见证。

3月18日,人文版刊登魏同山《蓬莱潮水惨案》,潮水人杨建人等老先生致电反映,上世纪60年代他们曾专门就潮水惨案做过深入访谈研究,《蓬莱潮水惨案》一文所引资料和所述内容与他们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,现刊登杨先生等所著文章,以警戒后人,前事不忘后事之师。

【以史为鉴】

难忘潮水大屠杀

杨建人 赵明元 张胜家

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、掠夺和屠杀,那是一段永远也抹不掉的血的历史。

今年是潮水惨案七十五周年。我们潮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小鬼子对潮水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。

蓬莱潮水镇过去是一个四周有高大围墙,有一千多户人家的大村镇。围墙有五个大门,墙外有护城河沟,围墙四周建有五个炮台,重点地段都建有城墙垛口,易守难攻。

1939年2月9日,即1938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日,是潮水镇的集日。为了防日本鬼子飞机轰炸,集市从村内中心大街搬到了村东河滩上(日本鬼子曾在1938年农历六月份,飞机轰炸潮水村中心大街,炸死四个平民)。上午九点多钟,从东北巨峰村方向传来枪声,继而又见东南方一群五百多鬼子打着膏药旗向集市方向奔来。顿时,集市乱了,人们四处逃散。

当时,潮水驻扎的是国民党杂牌军蔡晋康的十三、十四两个大队。毫无准备的他们紧急集合,关闭城门,登上围墙,仓促应战。十三大队守南门和西门;十四大队守东门和东北门。上午十点钟左右,战斗打响。日本鬼子兵分两路,重点攻打东门和南门。一时间,机枪、步枪响成一片,战斗十分激烈。这些国民党的杂牌军当时还有点中国人的血性,他们利用城墙上的垛口和炮台的有利地势,居高临下,与日伪军展开激烈对抗,有效地打击了敌人。一个上午,日本鬼子也没有攻进一步。中午时分,十四大队长王敬尧饭后登上围墙观察敌情,不幸中弹身亡,由彭中队长继续指挥。下午日本鬼子调整战术,佯攻东门,集中兵力攻打南门。到下午三时许,南门被点着火,十三大队长急令撤退,南门失守。十三大队长刘月卿在撤退途中,遭敌打援的伏兵射杀身亡。十四大队一看大势已去,也从北门撤走了。双方各伤亡四十多人,日军少佐指挥长小林金次和一个伪中队长也被打死。

日本鬼子打跑了刘、王部,穷凶极恶地冲进潮水街里,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。他们见人就杀、见草就烧,杀气腾腾。一股鬼子冲进杨式仁家,不分青红皂白,开枪射击,把屋里的老少五口全部杀死。其中还有一个吃奶的婴儿被他们用刺刀挑死,真是惨绝人寰。张嘉谋一家五口被打死三口;杨廷梓就两个儿子,大儿子被鬼子用指挥刀从脖子处斜劈而死,惨不忍睹;小儿子躲在厕所里被枪杀;东门里有五个外地打铁的,其中三人被枪杀,两个被鬼子用刺刀捅死;李福星一家七口躲在防空洞里,被鬼子烧死五口,打死一口,李福星一人活命,还被烧掉了一只耳朵。更为残忍的是,鬼子抓了三四十个青壮年,拉到东庙台上,用机枪给扫射了。其中一个叫张恩家的幸存者,我们采访时还亲眼见到他肋骨上的伤疤……

日本鬼子不但疯狂杀人,还肆无忌惮地放火烧房、烧草垛。一时间,潮水村火光冲天,浓烟滚滚。更有甚者,这伙强盗还放火烧掉了我们潮水镇一处宏伟古建筑“天庆庵”。其中两棵五百多年的银杏树也被烧死。

七十五年前的腊月二十一日,潮水镇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。被鬼子屠杀的人数达108人(含飞机炸死4人)、被烧毁房屋70多间、草垛90多座、古建筑一处。本来繁华兴盛、名噪蓬莱的一座名镇,转眼间被鬼子烧杀得血流满地、满目疮痍、一片萧条了。

日本鬼子对潮水镇大屠杀的历史,我们能忘记吗?

教堂:铭记基督文化的痕迹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烟台街头教堂之多,给任何一个游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昔日的《大公报》记者说,有46处之多,几乎每个十字街口都有一个教堂,所言不虚。

这些教堂尽管大小不一,但风格却大同小异。屋脊上都有一个醒目的十字架,墙上都有尖尖的窗户,镶嵌着五彩缤纷的玻璃。它们隶属于不同的

教派,但都定时开放。星期天有教徒走进去虔诚地祈祷,会传出来悠扬的歌声,伴着风琴,传得很远……

一座小城,教堂密度之大,教事活动之盛全国罕见,这是烟台文化兼容性的铁证,是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痕迹。

西方传教士在烟台抢滩最早,但烟台却没有“教案”,不是天津,也不是曹县,那里的教案令清朝封疆大吏焦头烂额,令地方官吏革职查办,更甭说伴随着腥风血雨了。但烟台平平静静,既上帝保佑,又阿弥陀佛!

可惜现在仍旧完好存续的教堂不多了,在南山路与三马路交会处有一座东山教堂。

它与英国传教士马茂兰的名字连在一起,马氏口吃,下岗了改作花边生意,发财不忘职守,建了这座教堂,墙基上嵌有石碑,令他的同胞十分自豪,拍照不已。

在大马路与十字街交会处也有一座教堂,现在嵌有“天主教堂”的字样,其实,据《烟台宗教志》记载,它是“基督教堂”。“天主教堂”四字乃是1991年,著名书法家叶崧光老先生奉命所写,与历史事实不符。

这所教堂又名“慕雅哥教堂”,慕雅哥何许人也?他是最早来烟台的三个基督教传教士之一。当时备极艰辛,无处安身,只好在海边一艘破舢舨中藏

身。1867年遇到了捻军东进,包围了通伸,他在到烟台之前,曾访问过洪秀全的太平天国。这个自以为是的洋人,以为所有的中国农民起义军都似洪秀全,也拜上帝教,于是自告奋勇地当“上帝的说客”,勇闯捻军大营,力劝捻军头目,不要开炮,只要布道,结果被捅了17刀,去上帝那里报到去了。

基督教会认为他是“殉道者”,为了纪念他,修了这座设在张裕公司附近的教堂。这件事在通伸立有石碑,正反两面有中文和英文记述。石碑曾立在村道旁,文革中才不见了踪影,不过拓片却在《毓璜顶文化》上得到披露,成为异常珍贵的资料。

外国传教士体验胶东火炕

刘建昆

媒体报道,热衷于申遗的韩国如今要抢先为“暖炕”申遗。实际上,韩式火炕“温突”,是地板下的火暖系统,和中国的火炕并不相同。火炕一般是由贯穿一堵墙的烟道,把灶台和睡炕连接起来,烟给炕和房间取暖并最终从烟筒排出去。

烟台开埠以后,外国传教士先后来到胶东。他们对胶东的火炕很是感到新奇,有了和当地人不太相同的体验。

1861年来到胶东的倪维思夫人倪戈氏,在她的著作《我们在中国的生活》中,明确宣称“我很讨厌热炕”,但又不得不不说“但当地人似乎很喜欢它。”她详细地描述了外国人眼中的“炕”:“晚上当床,白天当沙发,是整个家庭的消磨时光的地方。妇女们休闲或缝纫时,通常以土尔其人的方式(盘腿)坐在炕上,他们也乐于在炕上吃饭。炕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平台,大约两英尺高,根据家庭需要的尺寸有所变化。有的还普通的床大,不过经常占据整个房间的一头;有的大约十二英尺长,最少有六英尺宽。其构造是,火点燃后,热量和烟雾得以从下面的烟道通过,使其每一部分都变得很温暖,但又不特别热。因为可以保温很长时间,睡觉在上面

的人不容易患感冒,即便他们盖得很少。”

对于烧炕,她则写道:“你经常能看见一个小女孩在灶台——就像小床,也叫锅台——旁席地而坐,把秸秆从灶门中投入,每次少许,以保持稳定的火焰。”后来,长期居住在黄县的传教士浦其维家族,不但在其居所留下了炕,也留下了不少关于炕的表述和照片。如浦其维夫人浦安娜写道:“白天,那里是孩子们很好的托儿所、缝纫间以及女人们的会客室,上面暖和和的,他们会舒适地盘腿坐在那上面,到了晚上,那里就是家中宽大的睡床。”她把黄县居所火炕的照片收入了著作《从零开始》。他们的女儿浦爱德,打小随父母在黄县生活,对炕的喜爱更是不言而喻,并且留下了一张幼时和弟弟中规中矩在火炕上的合影。母女俩在所写的书中都饶有兴味的收入了一则关于火炕的谜语:“团团头,方方腰,一个尾巴丈高。”

19世纪20—40年代在胶东生活的浸信会传教士柯里培,则有过一次“炕床鲜体验”,他笔下的炕是这样的:“中国人用晒干的泥块做成的砖砌成平台,台上面再砌上泥块,并用灰泥铺平,干了以后再放上草席当床睡。炕床的中间是空



心的,床的靠脚那端放了木柴,冬天时可以让烧饭炉子冒出来的热气从炕底下通过,以使台面温暖。”

有一次,柯里培和几个传教士从莱州到黄县去开会,坐公共汽车回莱州时,刚走了约二三十公里就碰上大风雪,只好在龙口停了下来。他们虽然都穿了厚厚的大衣,可睡觉时只有一条毯子可盖。龙口附近没有西式的旅馆,只有中式的客栈,是没有床的通铺。入住后,柯里培请店里的人用煤生了火。烧了半小时,柯里培觉得炕上面的垫子还是冰的,就请他再添一点煤,可是他不肯,说:“你初到此地,你不懂。”柯里培心道:垫子还是冰凉

的,这有什么不懂。但是也没有办法,他决定穿上所有的衣服,并用皮帽子盖住耳朵,裹着毯子睡觉。没料到的是,睡到半夜时,竟被热醒了,全身像是烧起来一样,只好拿掉毯子、脱掉毛里子大衣、解开外套、背心,这才凉快下来。柯里培这才知道,炕上有8—10厘米厚的泥,要很长时间热气才能传上来,可热了之后,可以保持很久都不冷却。

柯里培用“烤熟的背”来形容睡炕的感觉。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常念叨的一句顺口溜:“炕烀皮,睡不沉;皮烀炕,睡到亮。”这正是同一个道理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胶东才有“大小伙子睡凉炕——全凭火力壮”这样的歇后语吧!

征稿启事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
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行走烟台QQ群号:227321056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

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

收 邮编:264003